

中华帝国的建立

章开沅 马敏 主编

贝德士 著，池桢 译，田彤 校



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文库贝德士文献专辑

中华帝国的建立

章开沅 马敏 主编
贝德士 著，池桢 译，田彤 校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帝国的建立 / (美) 贝德士著 ; 池桢翻译.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444-9044-3

I. ①中… II. ①贝… ②池…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4105 号



责任编辑 庄晓明

封面设计 周亚

中华帝国的建立

章开沅 马敏 主编

[美]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著 池桢 译 田彤 校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044-3/K·0060

定 价 59.8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Miner Searle Bates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Yale University

In Candidac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1935

概要

公元前3世纪末,在中国,骑兵得到广泛使用,通信有所提高,货币规模持续扩大。凡此,都是在技术层面有利于权力中央化的条件。正是在诸种条件下,分布在华北地区的形形色色的诸侯国,逐渐走向统一。领导这场统一运动的,是来自西北的军事强国“秦”。秦国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是拥有一位致力于征战的统治者。此外,秦国在与匈奴骑兵的对抗中,获得了来自中亚的战术和装备,这让它的优势更加明显。秦国所奉行的原则,要优于那些保守、半封建的诸侯国所秉承的传统。这一点,在其横扫对手的过程中,一再得到肯定。然而,最高统治精英个人的失败,让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最终被来自地方的仇恨所彻底埋葬。秦帝国的反叛者四分五裂;而刘邦的“(西)汉”政权,从中脱颖而出。西汉以一种较为宽松的方式,继承了秦帝国的制度。在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任内(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新王朝在内政建设和开疆拓土两个方面,成就非凡。当时,虽然秦帝国的规制在西汉的运作中,依旧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因为鼓吹仁政思想,以及主张从通晓儒经者中拣选官员,赢得了王朝的认可。正是因为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努力,中华帝国在事实上已经建立;同时,具有显著连续性、持续至辛亥革命的诸多国家要素,业已形成。

目录

概要 / 001

导论 / 001

第一章 针对史料的批评 / 005

第一节 《史记》与《汉书》 / 006

第二节 其他史料 / 024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 037

第一节 秦国的兴起 / 038

第二节 秦国成为一个帝国 / 050

第三节 秦始皇的统治 / 060

第四节 秦帝国的崩溃 / 072

第三章 汉朝的建立 / 079

第一节 汉朝的兴起 / 080

第二节 汉高祖 / 087

第三节 汉惠帝与吕后 / 097

第四节 汉文帝 / 103

第五节 汉景帝 / 113

第四章 汉武帝的统治 / 119

第一节 牛刀小试 / 120

第二节 战争和扩张 / 124

第三节 帝国权威的建立 / 134

第四节 接纳儒学 / 144

第五节 领袖与帝国 / 154

第六节 经济与公共财政 / 160

第七节 公共工程与工商食官 / 167

第五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行政 / 175

第六章 政治原则 / 189

第七章 经济因素 / 209

结语 / 220

参考文献 / 222

附录一 / 228

附录二 / 235

导论

爆发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给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又译麦笃思)以启迪,让这一喜欢沉思的人,开始研究中国人及其变乱。他在著作中写道:“概括地讲,在差不多两千年前,当传统的封建制度被权力中央化的政府体制取而代之时,一场了不起的政治革命就在中国发生了。”^①

一位知识渊博的世界史学者近来亦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world-state),从公元前221年建立伊始,直至1911年满清王朝结束,持续存在了2130年之久。罗马帝国与中国相比,只在西方存在了差不多四个世纪;而在长达1484年的时间里,苟活于近东,再后来更是沦为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块飞地。作为世界性的国家,只有古埃及的历史比中国悠久。古埃及相继被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化;但在此之前,它存在了三千年之久。”^②

最近十年来,两位古代史专家曾论及秦汉巨变的重大意义:“那个老旧的中国已经确定不复存在;在其废墟之上,一个新的中国正在组建起来”;^③“就秦始皇皇帝而言,他结束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④这两位学者并不为人熟知,但是他们都具有缜密的思维。抛开两人对中国历史的泛泛之论不谈,他们都强调一个权力中央化的帝国的重要性。新的政治组织和行政区划,具有超乎寻常的连续性。这让我们更有兴趣去研究秦帝国最初得以建立的情况。

就其本质而言,这一巨大的变化,绝非凭借一纸命令就可以完成。变化的根源,部分地存在于该民族长期以来的历史进展中,部分地来自具体条件的非同寻常的集中出现。变化本身,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87年,中华帝国逐渐形成,并经历了最为重要的变迁。本书的目的就是去探究公共事务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其着重点在制度;同时,对那个由传统、情势、个人及概念构成的不断演进的复合体,亦有所关注。本书最终希望能够讲述一个

① 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中国人及其变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伦敦及孟买(Bombay)史密斯兄弟、史密斯和泰勒出版机构(London: Smith, Elder & co.; Bombay: Smith, Taylor & co.) 1856年版,第25页。

②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6年版,第227页注释2。

③ 马伯乐(Henri Maspero):《古代中国》(*La Chine antique*),巴黎博加德(de Boccard)出版机构1927年版,第425页。

④ 戴闻达(J. J. L. Duyvendak):《商君书英译》(*The Book of Lord Shang*),伦敦Arthur Probsthain出版机构1928年版,第1页。

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有关“中华帝国之建立”的故事。

迄今,尚无能达到此目标的研究。本书的研究方法是:直接使用主要史料,同时利用有关研究某一方面的富有启发性的专项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即便研究者是当代中国人,也会为语言所困。有关文本问题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依旧没有什么定论。涉及度量衡、钱币、技术及人物传记的著作,很不充分。大量有关散见于典籍中的资料的现代索引,亦未见到。可靠的考古、金石学资料,少之又少。此外,新的尝试,即突破千百年来占据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头脑的业已成为惯例的研究方法及阐释方才开始。与世界史领域中已经得到很好研究的一些地区相比,横亘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障碍,要更难克服一些。这些障碍,对过去和不久将来所努力、志在令人满意地揭示中国的过去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史研究需要数以百计、涉及众多主题的严谨著作。确有尝试之作,但都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这些著作与所要研究的问题脱节;另一方面,整体上,它们不知所云。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进展是这样取得的:选取一定的资料,对其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同时,带着新的研究问题,把前期成果综合起来进行再考察。这让人有一种架桥的感觉:在不确定性的泥淖中,从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走到另一个地方去。不过最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确实是在认真地探索秦汉史。在目前的研究进展中,让人感到乐观的一点是:一些已经开展或者正在积极准备中的研究项目,或许很快将推动这一领域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项目包括: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包括汉朝在内的断代史研究;朝河贯一(Kan'ichi Asakawa)的《中日制度史研究》(*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hina and Japan*);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远东研究促进委员会在国会图书馆开展的《汉书》释译,等等。

本书的孕育,得益于司马迁的治史精神。两千年前,司马迁写道:“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①这些话,并非一份说教性的序言,而是对其所著历史著作中某一部分的再正常不过的注解。司马迁无意逃避困难,而是为了避免作出具有误导性的陈述。在《史记》随后的篇章中,司马迁反复申明:历史中有许多地方,不为人知,抑或模糊不清。

在本书中,紧随针对史料及辅助材料的简要考察,有如下内容:作为新帝国

① 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译者注:贝德士在原文中,未提供《史记》《汉书》及其他古籍版本。译本中的古籍引文,系根据现通行版本订正。《史记》、《汉书》分别依据中华书局1959年版、1962年版。

绝对核心的秦王国;手中握有绝对权力的秦始皇在公元前 221 年完成对其他诸侯国的兼并,亦因“焚书”和修建长城而名噪天下;始皇帝去世后秦帝国迅速灭亡;西汉在国内的纷乱中兴起,并在汉高祖时期建立起一套经过改进的帝国体系;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帝国的命运;在杰出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华帝国的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大都形成;以及对早期中华帝国的行政体系、政治原则和经济要素的简要补充性介绍。

作者主要的精力用于撰写一部以“中华帝国的建立”为主题的信史。此外,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以及不少细节的完善上,本书亦被认为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关于《史记》与《汉书》之关系,迄今尚无全面的分析,只有一些局限性很强的实证性研究。许多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付出更多努力,将其研究与那个时代的事件相结合,借此阐明思想理念与政府实践。秦汉时代的公众人物的来源及其分类,也将被重新考察。针对执政时间悠长且地位重要的汉武帝的研究,将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开展。就作者本人的经验而言,最主要的困难在于:研究者希望能为每一个既宽泛又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主题投入更多时间,而这殊难做到。到目前为止,为这一研究付出的努力,对作者本人而言是最为有益的;当然,作者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亦能裨益他人。

本书对地理方面的参考信息进行了简化,从而无需使用详细的历史地图。地名使用的是现代省份和为人熟知的河流。为避免造成混淆,公元前纪年不再标注年号。本文统一使用为人熟悉的威妥玛拼音拼写中国文字和人名,不再过多插入汉字。当然,在读者真正有需要的地方,专业术语和名称也会用汉字拼写出来。就西文出版物中有关中国省市的英文拼写而言,只是在关涉中国的邮政系统等现代事业时,才会有所不同。

在本书中,《史记》简写为“SC”(Shih-chi),注明章节;所使用《史记》版本为泷川(Takigawa)本。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法译本《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简写为MH。《汉书》据百衲本,章节标注形式一遵常例。《后汉书》亦依据百衲本,未简写名称。

第一章 针对史料的批评





第一节 《史记》与《汉书》

秦汉史料集中在《史记》和《汉书》。《汉书》是《前汉书》的简称。这两本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无法估量,为“二十四史”奠定基础,确立模式。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写的中国历史,始于神话时代,终于公元前1世纪。后又有人补写了一些之后历史的内容。《史记》全书130篇,分为五个类别:“本纪”;“表”(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的关乎某一王朝、贵族或高官的大事简表);“书”(按照主题撰写的论文);“世家”(涉及旧王国的统治家族、私家大族以及汉代的封王);“列传”(篇幅约占全书一半,其中有关乎蛮族国家的作品以及按人物性质,如学者、商人等,撰写的作品)。

在“本纪”部分,一半的内容都与本文所研究的从秦始皇帝直至汉武帝这一时期有关。“表”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按月记载秦汉转型这一复杂的历史时期的史事;此外,还记录了汉代封地的名称、封王名称、重要王臣将相的封号等。“书”包含如下主题:礼、乐、律、历、天文、(汉代最高礼仪)封禅、河渠以及经济(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国家介入税收的“平准”实践)。其中,有关河渠与经济主题的“书”跟本文直接相关。“世家”部分最为简单概括。在30篇“世家”中,差不多一半与秦汉时期有关,涉及帝王、封侯以及王侯的女眷。“列传”有70篇,差不多每一篇都涉及两个或者更多人物。在这些人物中,超过一半与秦汉两朝有关。这些传记涵盖了几乎全部秦汉时期的公众人物。跟“本纪”相比,“列传”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处理那个时代,保存着不少回忆录、言论以及诗歌。

《汉书》探索了整个西汉的历史(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体例上采用



《史记》，但是剔除了“世家”。《汉书》中一半以上的编年史资料、绝大多数“表”，都和秦汉时期有关。从规模上看，这与《史记》相当。《汉书》的“书”包括：历、礼乐、刑法、食货（广义上的经济）、祭祀、天文、五行、地理（包含有粗略的地名索引）、艺文（即依据皇家图书馆编订的现存文献目录）。《汉书》有70篇“列传”；其中，50篇跟秦汉史有关。在这50篇秦汉“列传”里，有35篇在不同程度上与《史记》中的有关篇章相似。一般而言，《汉书》和《史记》里的“列传”在体例上几乎是相同的。不过，《汉书》的作者倾向在一部列传里放入更多人物。因为有（包含多个人物的）合传，总量只有100篇的《汉书》的容量要大于130篇的《史记》。

迄今为止，让人最为满意的《史记》是泷川龟太郎（Takigawa Kametaro，即泷川资言）博士新近（1934年）在东京完成的《史记会注考证》。^①这本著作在学术上颇有权权威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在经史著作的原文中做夹注。至少在印刷术出现后不久，插入经史作品的夹注的字号被设定为比正文小一号、双倍行距。《史记》“三家注”就是这样与原文整合在一起的。后世学者因此不得不把自己对《史记》原文的贡献单列出来，以独立的文本出现。如今，泷川资言修正了“三家注”所带来的缺憾。最为重要的，泷川氏在其著作中，加入了从过去三个世纪中国和少部分日本学者的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成果。《史记会注考证》印刷精美，分为10册，每册500页左右，按照西方书籍风格装帧。全书加注标点，每卷都有西式页码。泷川氏著的附录亦甚有价值。^②《史记会注考证》用中文著述。最常使用的《史记》版本，如乾隆时期的殿本，因为是中式纤薄风格，一共有20多本。

至于《汉书》，最令人满意且最常使用的版本，出自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③这一版《汉书》，是1034—1038年间印刷、备受尊崇的北宋版《汉书》的重印。不过，《史记》至今未加入重印系列。百衲本《汉书》没有标点，加有旧注。该书为中式印刷风格，共计32册，密集印刷成140个页面。殿本《汉书》及其他常见版本，无论在文本还是版式上，都不尽如人意。它们通常印刷为较小的24册。有关《汉书》的最详尽注释，见王先谦的《汉书补注》。^④

① 泷川龟太郎（Takigawa Kametaro，即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Shiki kaichu koshō*）第1—10册，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院（Toho Bunka Gakuin Tokyo kenkyujo）1934年版。

② 附录简洁而内容较全面，计有：司马迁传；司马迁年谱（含同时期大事记）；司马迁使用的史料清单；著作名称、体例及结构；对《史记》原文的增减；中日有关《史记》的作品。其中的内容多来自其他学者。泷川资言的批评并不极端，而是深思熟虑，小心谨慎。

③ 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于上海问世。较早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四部丛书》中亦有《汉书》。

④ 见1900年于长沙出版的《汉书补注》。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所依据史料的来源,有必要简单谈谈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公元前 140 年—前 110 年),司马谈在汉武帝麾下担任与天文及历法事务有关的中下级官员,接受过儒学及道家学说的训练,更心仪道家之论。^①司马谈对自己的家世非常自豪。他的先祖中,有些人在秦汉帝国担任过颇有地位的将军或官员。他对过去的事件和思想充满兴趣,更为儿子司马迁留下一项撰写历史的未竟任务。^②公元前 110 年,司马谈在前往备受重视且为西汉第一次举行的封禅祭祀的途中,不幸故去。是年,司马迁 35(或 40)周岁。司马迁在距离首都长安不远的地方出生长大。孩提时代的他熟悉乡村生活,有机会接受教育。20 岁上下,司马迁开始游历大江南北。在《史记》中,因为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情势和铭文,司马迁经常提及曾经的旅行。公元前 111 年,司马迁作为有一定职阶的皇室秘书,奉命出使四川及西南。^③

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位。在公元前 104 年的历法改革中,司马迁为新历法的准备和颁行做了大量工作。修订、颁行历法不仅是一件实际的事务,也是一种关乎王朝合法性的宇宙—政治论表达。在当时的中国,王朝的命运被认为与宇宙的力量直接相关。^④在这一时期,司马迁能够继续撰写《史记》。平日里,司马迁的工作负担不重,所做的事情也很容易与其兴趣相联。公元前 99 年,司马迁的好友李陵将军,在西域严峻的形势下苦战失败,最终向匈奴人投降。宫廷里养尊处优的大臣对李陵进行无理指责。司马迁对此非常愤怒,挺身极力为友人辩解。但是,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这是在批评负责此次作战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未能解救李陵,他对这次战役的指挥也饱受时人非议。但李广利备受皇帝宠信,势力庞大。结果,司马迁被诬试图欺骗皇帝。他人微言轻,更无钱财,也就无法逃脱被处以腐刑的命运。派系间的恩怨,非吾等所能预料。司马迁很快又出现在宫廷的要害部门,并且(很有可能)活到武帝一朝的结束(即公元前 87 年)。司马迁没有撰写公元前 104 年及之后的历史。一些人认为,随李陵事件而来的屈辱经历,影响了司马迁的写作,特别是改变了他对自己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看法。即便如此,这些都根本无关紧要。^⑤

没必要考虑太多《史记》所涵盖的较早历史时期的起源及性质。沙畹(Édouard

① 见《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文中直接提及司马谈的生平,及司马谈对先秦思想流派公正客观又富有批评性的评论。

②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司马迁的〈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第 1 册,第 7-23 页。

③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 1 册,第 23-33 页。

④ 见《汉书·律历志上》,《汉书·郊祀志上》;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 1 册,第 34-36 页。

⑤ 见《汉书·李广苏建传》;《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 1 册,第 36-40 页。



Chavannes)曾经描述过《史记》有关较晚历史时期记载的一般特征。其言:“一个混乱的年代紧随光荣却又暴虐的秦始皇帝及无能的秦二世时期而来;汉初一百年的帝王将相。……这些,都是《史记》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我们认识到:从本文研究的这个时代开始,中华国家有了自觉意识。我们也看到:司马迁所提供的历史细节之丰富,几近无限;他对历史事实观察的精准性,影响了以后历代中国史家。正因为此,《史记》成为世界上最为不朽的历史著作之一。但无疑,司马迁依旧保留自己的本来身份——一位编纂者。……但我们不能说司马迁在选择史料上有非同寻常的智慧。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司马迁耐心的审查。司马迁极少谈及二手著作。……司马迁拥有太史令的职位,故而可以自由接触宫廷中的文档。他发现:从公元前213年起,所有重要事件的记录都珍藏于斯。”^①

沙畹估计在《史记》有关秦汉的记录中,三成由文件、讲话、对谈等组成,属可信之作。虽然这些作品的风格缺乏个性,同时司马迁对自己的观点有所约束甚至隐而不见,但是细致的描述比比皆是,让人恍若置身于当时。《史记》中有不同甚或矛盾之处。其原因在于:书中不少部分直接引自原文件。文件有不同的来源,作者的转述亦有差异。这就表明:无论是司马迁本人,或是后来的编辑者,都没有试图去调和这一困难,亦未尝试建构一种似是而非的真实。根据其内在证据以及我们对司马迁的了解,《史记》在世界范围内,的确是一本非凡的历史著作。遗憾的是,关于《史记》的流传,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许,这些问题永远都不可能获得解决。

抛开《史记》在《汉书》撰写中的作用不谈,从其问世以来,这本著作在汉代一直有一批为数不多但颇有分量的读者。司马迁把一套《史记》放在皇家图书馆;另在都城中置备了一套,供人阅读。《汉书》称司马迁去世后,《史记》逐渐不为人知;直到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已被封侯的司马迁的(外)孙子杨惲,让这本著作变得声名鹊起,并为之撰写详细的解释。^②后来在王莽的新朝(公元9—23年),《史记》更加受人推崇,甚至有人建议司马迁的子孙应该被授予封号,以表达对史家的敬意。^③早在公元前81年,当宫廷里发生一场有关经济事务的激烈辩论时,大臣桑弘羊就引用了《史记》。^④同样是在这场辩论中,《史记》以及追随它的《汉书》中所描述

① 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1册,第156-157页。

②③ 见《汉书·司马迁传》;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1册,第199页。

④ 伽乐(Esson McDowell Gale):《〈盐铁论〉:古代中国有关国家对工商业控制的争论》(*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 Debate on State Contr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 Chapters I-XIX*),莱顿(Leyden)博睿(Brill)1931年版。



的复杂的经济制度、连同具体事件,都获得证实。^①在公元前 28 年,曾发生一起充满敌意的事件。一个世纪后,当《汉书》问世时,这种敌意又出现了。^②当时,皇帝的叔父到皇宫借阅非经典著作以及《史记》。主管拒绝他的请求,理由是:非经典著作与儒经相悖,批评圣人,鼓吹迷信;而《史记》中,则包含王侯不宜的权谄谋术。^③在围绕儒经《春秋》展开的派系之争中,有学者在一份公元 26 年呈给皇帝的奏折中,严厉指责《史记》“违戾五经,谬孔子言”。^④大概在公元 82 或 83 年,思想家王充依旧在使用司马迁的作品;他的引文非常接近现有的《史记》文本。这里提到的时间非常重要。其时,对《史记》的删减已完毕,《汉书》主体部分的撰写即将完成。王充视司马迁为汉朝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甚至把他比作黄河。王充对司马迁仅有的一般性批评是:《史记》中作者自己的观点太少了。^⑤试举一例。王充在《论衡·感虚篇》中提到:司马迁认为那些关于神异事件的报告,或是“虚言”。对此,王充评论道:“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而云‘虚言’,近非实也。”^⑥

另一个关乎《史记》文本的小问题就是褚少孙为原书补写的篇章。褚少孙大体在公元前 1 世纪的最后 25 年,完成了这项补写工作。其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20 年。^⑦显然,褚氏增补的部分都署名标明,质量上也逊于原著,通常置于司马迁原文之后。整体而言,褚氏补写的内容,相当一般。故而,识别出这些补写的内容,并非难事;它们甚至可以暗衬出司马迁原文的准确。褚氏之外的增补可以忽略不计。较早期的注释及《汉书》出现之后,这才真正引出问题。问题集中在《史记》《汉书》两本著作的关系上。

裴骃在公元 465—472 年担任文书类高官,为《史记》中有难度的词语和句子作注。他广泛引用徐广的著作。徐氏的作品产生于 5 世纪的头 25 年。在 8 世纪刚开

① 伽乐(Esson McDowell Gale):《〈盐铁论〉:古代中国有关国家对工商业控制的争论(第 1—19 章)》(*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 A Debate on State Contr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 Chapters I-XIX*),莱顿(Leyden)博睿(Brill)1931 年版,第 76—77 页。

② 很奇怪,泷川资言把这一事件列入东汉时期。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出版刊行社 1955 年版,第 5360 页(泷川氏原著第十卷《史记总论》第 112 页)。

③ 《汉书·宣元六王传》。沙畹也使用了这条记载,见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 1 册,第 199—200 页。

④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⑤ 佛尔克(Alfred Forke):《〈论衡〉上:王充的哲学论文》(*Lun-Heng; Part I: Philosophical Essays of Wang Ch'ung*),莱比锡(Leipzig)Otto Harrassowitz 出版社 1907 年版,“导论”(Introduction)第 37 页。

⑥ 英译见佛尔克:《〈论衡〉下:王充的各类文章》(*Lun-Heng; Part II: Miscellaneous essays*),柏林 Londres 出版社 1911 年版,第 177 页。

⑦ 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沙畹已经把他所认为的增补部分从注释中选出汇总,见沙畹:《司马迁的〈史记〉》第 1 册,第 203—210 页。